

[3] 施联朱等:《福建福安县畬族情况调查,1958年》,《畬族社会历史调查》第134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 乾隆三十九年福宁府告示〔霞浦县正堂碑文〕,俞郁田编纂《霞浦县畬族志》,第479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5] 同上书,第2页。

[6] 民国八年《礼俗志·杂俗》,《南平县志》卷一一。

[7] 余钟英:《礼俗志·畬民附》,《古田县志》卷二一。

[8] 《清史稿》卷一二〇《食货一·户口·田制》。

[9] [清]张景祁:《疆域》,《福安县志》卷三。

[10] [明]何乔远:《风俗志》,《闽书》卷三十八。

[11] [宋]王十朋:《入长溪》诗,《闽书》卷三十一。

[12] [15][清]李拔:《地理志·塘堰》,《福宁府志》卷五。

[13] [宋]梁克家:《水利》,《三山志》卷第十六。

[14] [20][清]陈一夔:《甘棠堡琐志》卷上。

[16] [清]张景祁:《氏族》,《福安县志》卷终。

[17] [清]李拔:《食货志·田赋》,《福宁府志》卷十。

[18] 明万历四十年“福安县官民田地园塘山地一千二百二十顷八十七亩九分九厘有奇”(见清·李拔:《福宁府志》卷十《食货志·田赋》)。迁界抛荒面积484顷。据清·杜臻《闽粤巡视纪略》(转引自朱维干《福建史稿》下册,第396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9] [清]李拔:《艺文志·祥异》,《福宁府志》卷四十三。

[21] 蓝炯熹总纂:《福安畬族志》,第116—122页。人口、户数皆为1990年数字,未加县名的村名均为福安地名。

[22] [清]张景祁:《疆域》,《福安县志》卷三。

[23] 宁德地区方志委编:《宁德地区志》,第1589页,方志出版社1998年版。

[24] 蓝新福主编:《福鼎县畬族志》,2000年编印,第46—52页;俞郁田编纂:《霞浦县畬族志》,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0—54页;蓝纯干主编:《宁德市畬族志》,第11页,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版。

作者单位:福建省宁德市民族中学

调适畬族家族法，构建畬族地区和谐社会*

雷伟红

畬族家族法是依据畬族或畬族地区的社会组织的权威而形成（自然形成）或约定的，主要调整畬族内部家族关系，具有习惯性的行为规则的总和，是畬族习惯法的重要组成部分。畬族家族法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几乎涵盖畬族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历史上，畬族家族法在畬族地区，许多条文都具有一般性规范的意义，所涉及的规约对畬族村寨的群众乃至全族人民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一旦违反，将按照家族法的规定论处。新中国成立后，畬族家族法中与宪法相违背的规定受到制约，但与法律法规不相冲突的规定在畬族人民乃至畬族地区仍具有相当的约束力，违背规定的人会受到普遍的舆论谴责和道德压力。

一、畬族家族法的内容

畬族家族法主要记载在畬族地区的家谱、族谱、村规民约以及地方史料中。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关于结婚的规定

闽东、浙南的畬族男女婚姻历来都自主，但在历史上，福建连江辋川蓝氏畬族村寨男女婚姻却不自主。1871年清同治10年修订的《连江辋川蓝氏族谱》记载，男女婚姻要遵守如下规定：（1）对“婚配之家”，必须征得家族首肯，“先请明尊长合议可否阅阅，必期相称”。唯一的标准是“娶妇嫁女，必择孝悌。妇婿不可不择，甚

*本文属于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4年重点课题《论畬族家族法》的研究成果。

矣。世有行义者，则子孙慈爱孝悌，不敢淫暴。”选择妇婿要讲求名分，有相对的标准：“嫁女必须胜吾家者，胜吾家，则女之事必钦必戒，娶妇必须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敦妇道，不可不知。若我子孙不问名分，征践逆乱之家，贪财私对者，不许与祭会拜，削谱除名。”（2）对婚嫁之事，须简易从事。^{〔1〕}

在通婚范围上，历史上实行族内婚，同姓不婚，畚汉不婚。现在这种现象在闽东、浙西南等地的畚族乡村中有所改变。《福安畚族志》载，“据1990年第4次人口普查资料统计，坂中畚族乡18个村民委员会（缺井口、坂中）累计，1608对夫妻中，族内婚1523对，占94.71%；畚娶汉45对，占2.8%；畚嫁汉40对，占2.49%。”^{〔2〕}可见，尽管族内婚仍是主流，但畚汉不婚被改变。并且在族内婚中，同姓通婚日渐增多。在浙江云和县山脚畚村，截止到2005年8月为止，同村同姓通婚共有5对，其中同姓不属于同房组织有4对，同姓又同房组织有1对，畚族家族法是严禁同姓同房男女通婚，因此这对年轻男女的结婚，家里、村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对此有微言，但因它符合婚姻法关于同姓三代以外旁系血亲允许结婚的规定，即使有反对，这对年轻人还是如期举行了婚礼。

过去畚族婚姻缔结形式有四种：一是女嫁男方。有子有女的家庭，一般是把子留家娶妻，把女嫁出去作媳妇。女嫁男后，保留女姓，对生父母不负供养义务，不继承生父母财产，只在年节按当地的礼俗给父母纳礼。对男方父母同称父母，不称公婆，所生子女从夫姓。二是男嫁女方。把儿子像女儿一样嫁出到女家落户。畚家有女无子的家庭多行招亲，借此延续家庭增加劳动力。女方要付给男方一定财礼作为赡养男方父母的养老金。女婿不受歧视，相当于儿子，必须改姓。所生子女从女姓，对女方父母亦称父母，不称岳父母，男方可继承女方财产，族亲不得干涉。其家庭地位与女方平等。男嫁女后，对生父母只在年节送礼，不负供养义务，不继承生父母

财产。三是男女互嫁。畲家如新婚夫妇双方都是独生子女，或父母多病，弟妹尚未成年，缺乏劳动力时，新娘新郎就要种两家田、赡养两家父母。若夫妇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继承双方财产权，供养双方父母。四是子媳缘亲。畲族有些有子的贫困家庭，唯恐日后无力娶亲就抱养童养媳，待童养媳长大与儿子成亲。

（二）关于离婚的规定

过去浙江、广东畲族一般不允许离婚。如夫妻双方的确无法继续生活下去了才准离婚，但福建畲族允许离婚。夫妻离婚时，有的要举行脚踏手印的离婚仪式。请双方父母、族中老人就餐便饭，以作佐证。至于孩子，姓谁的姓就跟谁。议定好双方财产的分割后，由代笔人写好离婚书。在离婚书上，离婚人不是盖私章，也不是按手印和画押，而是按“脚踏手印”，其脚为左脚全印，手为右手全印，男女双方按上“脚踏手印”后，离婚手续即告完成。福建宁德畲族离婚很简便，只要女方退还男方一部分聘金，再嫁时，后夫与前夫做“生嫁谱”为证，由前夫押号（即签名盖章）。离婚后，夫妻双方财产分割如下：由提出离婚者承担婚嫁中的经济费用，有的还需赔偿对方的身价，其身价也不苛求昂贵，仅以二三十块银洋表示一下意思。其他如家具衣物、农具等，婚前是谁的就归谁，原物不在的可折价赔偿；若是男方不要女方，家具农具房屋等平分，犹如家中兄弟姐妹分家，双方均可各自成家，女方可向男方索取高于聘金的钱；如赘婿后家庭关系不和，不愿在女方生活，经劝说无效可允许回家，但离家时需付一笔双老的赡养金。

（三）关于家产分割的规定

家产分割指家庭的生产、生活资料，包括田园山林、房屋住所等在家庭成员之间的分配，表现为畲民分家，过去有三种方式：一是兄弟平均分配财产，长子、长孙可多分点。父母在世时，一般由舅父主持分家事宜，邀请族亲评判，并要留部分田产供父母作“养

老田”。父母死后再把父母的这份财产平均分配，或留作祭田，俗称“众田”。但长子可以多分一些，如果长子有长孙，可先抽出一部分相当于每股所分的土地，其余再按几个兄弟平均分配，一般因田地太少只适当照顾一下长子就可以了。没有娶妻的兄弟可多得一些，称为“老婆本”。余下的田地山林则进行全面的评估，按田地的好坏搭配，分为数股，由数个子女平均分配，并以抓阄为定。住房的分配，一般凭惯例“左大右小”，即长子分前左厢房，次子分前右厢房。

二是不论长幼，完全平均分配田产。浦城县留墩村《蓝氏族谱》所载的清代崇安县星村蓝氏兄弟析产合同，蓝氏兄弟共六人，“承祖置有地基房屋壹所，墙围四至分明。……依母命俱各分爨，但有田园房屋当凭以作六股均分，各立分关一张，所载明白。……所有原房屋地基朱契，坟山杂木竹山朱契，俱付长房收存。”^[3]三是立合同阄书分配家产。清同治元年（1862年）重修的光泽县积谷岭畚村《积谷岭雷氏族谱纯斋儒人·黄氏七房分业阄书遗嘱》载，光泽县积谷岭畚村雷氏“诚恐诸妇异姓难保无分门割户之患。于是请诸亲知证，将夫在日用银已买田租贰仟四佰二十八硕，夫故之后物财丧礼费用已尽，切虑子孙分异之后，营备冢圻末亡之事必相推调。拨出田租壹佰五十硕准银与器为营坟殡葬礼仪。又拨出日租二佰二十五硕与孙男祥为氏备归世丧事殡葬礼仪。仍立祀田租八十石与子孙轮流祭祀。尚有租谷一千九佰七十三石，并夫在日与弟庆天顺间共财开垦溪演草埔等处田土租粟三佰四十石，又在日与堂弟庆宽共乘绝户苏长生等户田土租粟约四佰一十三硕，载官民米四十一硕二斗二升，内除一分租粟一百：十硕零载米一十三石五斗七升与宽执管外，余二分并有共财开垦及氏已置田租共计二仟五佰八十九石，除有子侄装贗私买田租，各凭契执管永熠。其余田租、房屋、牛只俱均分七股，粮差随业办纳应当军民二役互相帮贴，毋致推闪。”^[4]

（四）关于立继的规定

历史上为确保家庭繁衍和家族兴旺，无亲生子的家庭允许立继，畲族对此尤为重视，规定以承继为严，叙昭穆，别亲疏，以确保家族血缘的纯洁性，防止异性乱宗。根据1871年清同治十年修订的《连江辋川蓝氏族谱》记载，关于立继的家族法内容表现在：

1. 可做嗣子的人选。夫妇没有生育子女，首先考虑立同胞兄弟的孩子为嗣。次者，立堂兄弟儿子或立外甥为嗣。

2. 嗣子的选定。(1)坚持“长继长”原则，即“间有长子乏嗣，当以弟之长子嗣之”；(2)族有甥承舅嗣，侄以从姑者。(3)继嗣之义，当以“年齿相符”。“不可以子年转大于嗣父，亦不可以嗣父之齿，并于嗣子”。如果应嗣之子，人品不端，果属不肖，实迹可诛，如要重择嗣子，须经族内公议，“仍听其于族房中另择贤嗣，公立嗣章。毋得藉此为题，致生篡产之渐”。^[5]

3. 嗣子的地位。既系养子，有继承权。立继须在族谱中注明：“嗣父之下某人子也”；并注明：“生父名下，亦注之立为某人嗣”——为了“出入详明”。“其(指过继之子)生庚直书嗣父干下，明其为人子，不得顾私亲也”。间有己子未生，先将应嗣之子畜育。后生亲子，其产业例应对分。“嗣子固不得谬以抱养之言，侵吞一家之产。而已子亦不得托以归宗之例，全得合家之财。至于嗣子，自愿归宗，只以手泽与之，不得据以对分，兼得两家之财焉。照凭公议，非挟一己之私见也”。^[6]

在畲民的散村，对立继没有严格规定，择继的范围十分广泛。

(五) 畲族妇女的地位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妇女的地位与男子一样高。妇女与男子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在家庭中，妇女同男子一样管理家庭事务，畲族妇女不仅是家庭主妇，而且也直接参与对家庭事务的商议和决定，畲族云：“寮里无娘难当家。”她们管理家庭的好坏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兴衰，有的畲乡，妇女还是一家之主，特别是大家庭中的老年妇

女，家中的一切事宜，由她说了算。如遇到纠纷斗殴，只要妇女出面制止，干戈立即平息。

寡妇再嫁非常自由，不受干涉。寡妇既可招夫养子亦可改嫁，但不能同小叔结婚，畚族人认为“父不在长兄为父，娘不在嫂为娘”。有子女的年轻寡妇可以留在夫家招郎入室做本户继承人，这种招来的男子一般要改姓妻子前夫的姓，所生的子女跟前夫的姓，但他受歧视，没有处理财产的权利，夫死无子的妇女一般是改嫁。

二、畚族家族法的社会功能

1. 在历史上，畚族家族法曾起过保家卫族的作用

清代，闽南地区家族械斗频繁。根据惠家山腰钟厝、鸢峰《钟厝村史》载，清末，钟厝和前黄村来村械斗达20余年，双方共死亡20余人。在闽南（包括泉州、漳州、厦门）钟姓畚民的家谱中，都记载着畚民保护村寨的《寨规》，内容有十款：“一是清蠹，对寨之大蠹，即有心怀异志，阴蓄诡有心怀异志，阴蓄诡哗，无端起风波，背地密煽惑，以致内离志、外懈守者，以及阴觊财物或窃米谷或盗首饰等件的蠹贼，法所俱戮。二为除奸，至寨内之人潜匿之，而不露其迹，隐忍之而不彰其名，包藏之而不明眷属者，此亦内奸透贼者也，俱法所不赦。三是去恶，对最恶者，许寨内人等，捆绑送县究治，对恶流，俱以法治。四是核，今既编册书约处寨后，遇每月朔望，齐赴寨内公所，听寨长逐名点查，详鞫近日所为何事。或寇将入境，寨长须不时查点，寨外人不许入，寨内人不许出，除遣侦探外，有紧要事务，不得已欲出者，当通知寨长与寨内诸人，如径自潜出，则亦以透贼论。每东西二门，各设二人稽察，出入不得怠忽。五是训，寨内子弟，对寨长与父老谕以‘公’、‘忠’二大之语，慷慨赴义之事，俱宜静领，毋得听藐。至修理寨营，演习武艺，出使公务，遣发侦探，把守关隘等项，犹宜听从，或当有警发挥损益，

不得阻挠，如抗顽不遵服者，定以重典施行。六是御。每晚各门，编定十人司更，十人巡视。其司更每更、每门二人点筹，鼓鸣锣应，互相通闻。更点节次，务要明白，不得虚应。故事其巡视者，每更每门亦二人。东门巡者，东升西降；西门巡者，西升东降一。互相密巡，毋得贪睡塞责。又每门各设壮丁一名，各执军器守望，每晚每垛眼各设灯笼火把，自黄昏直至天明。一门有警，各门辅之，务为一体。寨长士民，当时时督率壮丁武夫，须人人先登，不得退缩。凡器械旗帜，一切应用之物，俱期精明。至以静待动之法，尤不可不详。若太平无事时，每晚司更巡守，亦须严密。七是备防。凡一切应敌之物，预备积之，至柴栅竹篱，亦宜预修严密。八是定赏。为激励忠勇者，制订了赏规：临阵先登击死贼者，赏花红银二钱；冲锋破阵，生擒一贼者，赏尝银五钱；遣发侦探，能知虚实，直捣贼之巢穴者，赏花红银一两。至及为寨捍御，身冒矢石触锋刃者，酌加奖励。九是明罚。为公务遣之办理而不从者罚，为有警发为塘报而不行者责，为守险使之而推诿者亦责，至临敌退怯不发奋为雄者戮。若小青薄罚示警而已。十是同寨。与寨诸人，共尽一心一德。立一议，宜共筹共画，取其确者而行；设一法，宜共斟酌，择其当者而施。干一事，不可独委一人；置一器，不可独归一家。皆宜分理而协助之。至御守，尤宜同心协力。凡有所为，俱平心静气互相赞助，将见心胆谐协，则血诚可壮河山，精赤可贯天地，合寨巩固无虞。”^[7] 通过《寨规》，集全村寨人的力量，防止和抵御外族的入侵，共同维护村寨和家族安全。

2. 在维护本民族的安定团结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中发挥重要作用

畲族家族法的许多条文都具有一般性规范的意义，所涉及的规约对畲族村寨的群众乃自全族人民都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任何人都得遵守，一旦违反，将按照家族法的规定论处。这对统一村寨群众

的行为，维护本民族的安定团结和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家庭方面，如忤逆尊长，则罚跪赔礼，在人际交往特别是与同族交往方面，如发生与人争骂相打，则赔偿名誉，并认为“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10]因此，在畚村很少发生争吵的事。畚民团结互助观念很强，团结互助不但表现在亲戚之间、本民族内部，而且在村邻之间，兄弟民族之间，互助友爱，共同解决困难，办好公益事业。敕木山村村民建房从动工到喜迁，大家帮忙，早饭在自己家里吃，只需管中晚饭，不用付工钱，称为“送工”。办婚丧喜事，全村户户送柴、送米、送豆腐，不用招呼，主动帮忙操办。遇天灾人祸，八方来支援，送米、送衣、送木头、送瓦片。据学者调查，畚民被问及当别人遇到困难时，83.02%的人会“鼎力相助”，13.21%的人“不理睬”，仅有3.77%会“落井下石”。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仍有59.26%的人认为畚族原来一人有事大家无偿帮忙好，5.55%人认为不好，20.37%的人认为要有偿帮忙。^[11]

再如偷盗事件，家族法规定处罚措施是如果偷窃小件物品如锄、犁等，只要退还主人就算了事，家境富裕的要罚请吃饭，如偷烧他人山场、砍伐他人木材，除赔偿损失外，还要罚款，或将原物归还原主，有的还要买些香纸到祠堂焚烧，点燃鞭炮，表示赎罪道歉，情节严重的还要罚办酒席。这些规定有力地保证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在畚族的许多村寨都很少发生偷盗的现象。1929年德国学者史图博到景宁敕木山畚村调查后认为：“畚民犯罪的人似乎很少。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听说过他们中有犯过罪的人。畚村里家家户户的大门都开着，没有偷盗案，没有人偷窃田地里的农作物，也没有人到另一村子去偷窃。谁都记不得这里曾有过谋杀和打死人的事。”^[8]1996年，有学者到敕木山作过问卷调查，问及贵村近来偷窃的人，37.5%的人认为很少，62.5%人认为没有。^[9]现在敕木山仍是夜不闭户。

三、调适畬族家族法，构建畬族地区和谐社会

（一）正确认识和对待畬族家族法

畬族的家族法在明清时处于逐渐发展阶段，在封建社会走向没落时已定型，它是建立在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畬族家族法作为畬族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传承性，而且“制度为适应变化着的经济环境而调整的过程可能是痛苦的过程。这个过程既不是平衡的，也不是完全的。变化可能在观念和关系体系的某一点上开始，并由此向外扩散。因此，文化中的某些观念或习惯完全改变了，而另一些仍然顽固地维持了下来。”^[12]有学者经过分析认为，中国 20 世纪为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而实行的一系列的经济体制改革对畬族的家族文化（包括畬族家族法）影响不大，现代文化尽管对畬族的家族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之间还存在着相互融合的现象。^[13]笔者在 2005 年对浙江省云和县山脚畬村进行过田野调查，发现畬族家族法并没有消失，仅是发生了变迁。由此可见，在当今畬族村寨，畬族家族法仍会对当前畬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秩序起着积极或消极的作用。

（二）调适畬族家族法，构建畬族地区的和谐社会

和谐是种秩序，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畬族地区要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对畬族的家族法进行调适。应当看到，畬族家族法在维护当前畬族地区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以现代的法律价值观来分析畬族家族法，可以发现它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不合理的因素。因此需要对畬族家族法进行全面的调适，使之能对构建畬族地区的和谐社会发挥积极的能动作用。

1. 去除畬族家族法中不合理的因素，并加以改造，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畚民原有火葬之俗，明万历《永春县志》载，畚民“人死，刳木纳尸。乃焚木拾骨浮葬之，将徙，取以去云。”^[14]随着与汉人杂居，再加上官府明令禁止，畚民渐渐改变火葬的习俗而实行土葬，并在家法族规中规定，在家族中如有违法而行火葬者，必将鸣官究治。1997年国务院颁布了《殡葬管理条例》，认为传统的丧葬习俗（土葬）是落后的、封建的、迷信的、愚昧的，对之应该加以取缔，进而提倡一种先进的、现代的、科学的、文明的丧葬规则（火葬）。浙江省云和县在2001年在畚村推行火葬，当年山脚畚村有3人实行火葬，遗体送去了火化，骨灰埋在自家的自留山底下。刚开始时，畚民是不太乐意的，后来却发现火葬比土葬好，也就被村民们接受了并自觉地实行。笔者认为，畚族分布的地区属于东南丘陵地带，区内山峦起伏，丘陵密布，海拔1000米以下丘陵山地占90%。山区县畚族居住在山腰、半山腰，平原县畚族大多住在山脚。畚民靠山吃山，实行土葬，占用了有限的山林资源，不利于发展山林经济，没有给子孙后代留下更多可用的资源，因此应实行最初的火葬习俗。

畚族家族法对作奸犯科者，给予的严厉制裁是“族人杖击(或‘石击’)”。依据家族法，实行祠堂审理。畚民将祠堂作为公正的法庭，对家族内的矛盾纠纷进行审理，多数由家族权威如族长、房长进行调停，一般均可得到妥善解决。永安市青水畚族乡百岂村《颍川钟氏族谱·贬钺录》载，该家族长房钟某(名字略去)诱骗其堂侄儿入山砍柴，以刀刺堂侄儿喉部，将他害死。因死者血流衣襟，乡人以为是死于虎祸。嗣后，经人侦知真情，以“草人衬衣追魂”，钟某自供实情。钟氏家族祠堂开会，“宰猪请出太始祖神主”，四房48位房长、户长齐跪神主前。族长“开言教诫”凶手，长房房亲一齐杖击凶手，将凶手打得死去活来后，以猪栏扛送到永安县城，鸣官究治。最终，钟某死于牢中。三房钟某某“为匪作恶”，被三房族亲用石头击毙，路人皆唾弃之。^[15]但因建国后，各种运动和改革政策如在农村实行

人民公社和村委会组织等一系列的改革，使国家权力延伸到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的程序被打破，传统的风俗、礼法、习惯、交往方式甚至家法族规都受到了冲击。乡土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农村秩序又一次经历了变迁和重构，传统的畲族家族法受到很大冲击。在山脚村已经没有族长、房长，现在的山脚村委会的范围大，包括原山脚畲村、附近 2 个畲村和三个汉族村庄。对家族内的纠纷不能通过祠堂审理来解决，再加上刑法知识的推广和普及，使得大家知道发生人命案件后要由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来解决。可见，在刑事方面，如杀人、严重违法和犯罪等这类属于国家最基本、最主要的社会关系，家族法已经被国家制定法所取代。

2. 继承和发扬畲族家族法中合理的因素。

家族法深深植根于民族的精神观念和社会生活中，是根据习惯、传统等制定和创立，它通过一代又一代的感染、传承，相沿成习，被模式化为一种带有遗传性的特质，它通过被人们反复适用，逐渐被人们认同为特定的社会群体所选择、接纳、共享的制度或规范，它还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净化得以绵延、传递，凝聚着人们的心理、智力与情感，因此，它在社会中有着巨大的、高度的稳定性、延续性、群体认同性和权威性，它事实上成为了畲民平时更为常用、更容易接受的法律样式，直至今日仍在一些地方广泛存续和流行。在山脚村，家族内部的纠纷，包括家庭纠纷、夫妻之间的纠纷，都是运用家族法极具特色的调解方式来解决。这种调解方式有两种：一是做娘家头的调解方式，妇女出嫁后，因受夫家虐待，而回娘家控诉，娘家组织亲房叔伯及母舅等数十人到男家里去评理，直到女婿认错并保证今后不再重犯再回来，这些人叫作“娘家头”，去作“娘家头”的人所花的路费概由女婿家承担，有的甚至可以随意把女婿家的鸡、鸭、鹅、猪抓来宰吃，任何人不得干涉。这样讲理和惩罚

的结果，自然是使得在畬族中虐待妇女的事情很少发生。二是巫术调解，一种特殊的家庭调解方式，借用神灵之手抚平家庭成员心中的涟漪。如果畬民家中遇到家庭纠纷、夫妻不和的，纠纷双方便可径自祈求插花娘娘出面评理和调解。在插花娘娘的庙中，人们插花为香，祷告神灵。由两个巫师盘唱巫歌，其中一人扮演神童，一人扮演插花娘娘，通过与神灵之间的交流，进行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心理疏导，以达到夫妻和睦，家庭相安的目的。^[16]这些调解方式比较简洁、方便、成本低、效率高，可以成为国家机关在执法中一种有效的弥补方式和协助方式。

畬族家族法遵从孝悌的思想，是维护家庭和睦的关键，从而达到家和万事兴。对于遵从孝悌者，受家族的褒扬，而不孝不悌者，要受到家族的惩罚。“嗣后族中有不孝者，族众宜共攻殛罚，令其自新。如不改，摒之出族，以儆无良。”^[17]明确在家中所处辈分，以身作则，尊祖敬上。“子弟当尊敬长上，坐则隅坐，行则随行。所以明有礼也，若有越名犯分，投明族长，责其不逊之罪。”^[18]强调兄友弟悌，和睦亲情。“兄弟本同气，连形如手足。孝父母，即宜和兄弟，戕兄弟，遂伤父母之心，记得言孝。为兄弟者，须式好无尤。勿因些微财产，而阋墙起衅，同室操戈，致乖元气。”^[19]至今畬族人民尊老爱幼，子女孝敬父母，父母抚养教育子女，兄弟间和睦相处，都是有口皆碑。

德治与法治兼用的治理民主的方式，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有着巨大的作用。畬族家族法往往以训诫为主，惩罚为辅的方式，让族人共同遵守所订立的条款。其中，训诫为德治，惩罚为法治。畬民家族德治教育的过程是渐进的，通过劝、严、戒、禁等步骤来表明畬族家族法对各种事项所持的态度，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表达得清清楚楚。而且对族人德治的教育是经常性的。因此畬民对家族法的内容了然于心。在此基础上，如果族人违反了家

族法，就对之施以处罚。这种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方式使畬族家族法在畬族人民中能得到有效地贯彻执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达到了人人信守，户户遵从。在当今，这种重孝悌的德治为主，法治为辅的方式仍为畬族地区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形势下，也可以先进文化的道德配合我国的“依法治国”，法治治近，德治治远；法治治身，德治治心。两者交相为用，国家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

注释：

[1][14][17]蓝炯熹：《畬民家族文化》，第 238—239、第 367—387、第 249 页，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2] 浦城县留墩村《蓝氏族谱》，光绪十一年(1884)。

[3] 光泽县积谷岭畬村《积谷岭雷氏族谱》，《纯斋儒人·黄氏七房分业阉书遗嘱》，清同治元年（1862）重修。

[4][5][7][11]连江《辋川蓝氏族谱》，1871 年。

[6] 宁德市猴墩畬族村《雷氏宗谱》，《本支百世夏房朝王公支派》，民国十六年（1927）。

[8] 漳州浦南镇《纯嘏堂钟氏族谱》。

[9] 浙江省少数民族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省少数民族志》，方志出版社 1999 年版。

[10][12]雷弯山：《思维之光——畬族文化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13] 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15] 万历《永春县志》卷三，《风俗》。

[16] 永安市青水畬族乡百岂村《颍川钟氏族谱》，民国二十九年(1940)。

[18] 福建省宁化县城南乡茜坑村《雷氏家谱》，民国三年（1914）修。

[19] 福安东山畬族村《雷氏宗谱·家训》，光绪三年（1877）。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